

论陆逊在夷陵之战中的军事指挥艺术

王前程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 吴蜀关键战役夷陵之战中,吴军统帅陆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面对蜀军大举进攻,陆逊采取了避敌锋芒、实行退却的战略方针;又从实际敌情出发,果断调整攻守方略,灵活机动,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在敌我相持阶段,陆逊忍辱负重,不逞血气之勇,耐心等待歼敌战机;在反攻阶段,利用天时地利以火攻制敌,又将水军优势发挥到极致,断敌退路,从而使蜀军全线崩溃,充分显示了一位杰出军事家过人的谋略智慧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对于今天军事学界有着深刻的教育启示意义。

关键词: 夷陵之战; 陆逊; 忍辱负重; 以弱胜强; 军事指挥艺术

中图分类号: K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8)04-0020-07

在历史小说名著《三国演义》里,陆逊的地位和名气并不显赫。但在史书《三国志》中,帝王之外独占一卷篇幅的三国英雄唯有陆逊和诸葛亮,足见二人在史学家陈寿心目中的特殊分量。从《三国志》的记录来看,陆逊、诸葛亮都是出将入相的历史人物。陆逊做丞相仅一年有余便忧病而亡,政绩不及诸葛亮突出,但在战场上则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军事威望高于诸葛亮。陈寿在《三国志·陆逊传》中评曰“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1]1005}可见,在陈寿看来,陆逊是一位极富谋略的军事奇才,是深受孙权赏识、能济大事的吴国栋梁人物。《孙子兵法·作战篇》指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一位精通战争艺术的将军,往往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命运。陆逊正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名将,在吴蜀之间发生的关键战役夷陵之战中,他发挥了令人叹服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表现了其非凡的军事才智。那么,陆逊在夷陵之战中采取了哪些英明的策略和手段从而战胜了强大的蜀军呢?

一、避敌锋芒,实施战略退却

汉末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闰十月,孙权遣吕蒙率部袭占了荆州南郡公安、江陵等重镇(今湖北公安县、荆州市),又遣陆逊率部夺取荆州宜都郡(今湖北

宜昌、恩施及重庆巫山县等三峡市县),切断了关羽兵退川蜀的水上通道,并于同年十二月擒杀关羽,控制了荆州大部分区域。过了一年又六个多月,即蜀汉章武元年(221年)秋七月,刘备发起了意在夺回荆州的伐吴之战,这是一场决定吴国命运和三国格局的大战,双方交战于荆州宜都郡境内,史称“宜都之役”,今习称“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

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一场著名的持久战,始于章武元年(221年)七月,终于章武二年(222年)八月,足足打了十五月(章武二年闰六月)。对于作战双方的参战人数,《三国演义》说蜀军七十五万,吴军二十余万,这当然是小说家的夸大之词。《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统兵“五万人拒之”^{[1]995};《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孙权上书魏文帝曹丕云“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1]59},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夷陵之战谈不上是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蜀汉参战兵力为四万人,东吴参战兵力为五万人,蜀汉军队略占劣势。其实,所谓“支党”即支派、党羽的意思,孙权上书所言的四万蜀军只是刘备的前锋部队人数。对于蜀汉参战总兵力,《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均无明确记载和说明。笔者曾根据《三国志·刘辟传》注引《傅子》关于陆逊“杀其兵八万余人”及《三

收稿日期: 2018-02-06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2017KF01)

作者简介: 王前程(1963-),男,湖北浠水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三国文化。

国志·陆逊传》关于蜀军“死者万数”等文献记载推断说“综合这些史料提供的数据,再加上投降曹魏的黄权所部及逃回白帝城的蜀军余部,蜀汉参加夷陵之战的总兵力应在十万至十二万上下。”^{[2]43}作出这样的结论,既是根据史料的记述,也是基于军事常理的判断。因为发动战争的一方往往是兵力强大的一方,刘备不会以区区四万人贸然去进攻东吴能征善战的五万军队的。“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争夺江南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那时两家联盟关系尚存,刘备就亲自带了五万人下公安,又命关羽率荆州兵三万奔赴益阳,共计八万余人参加对峙战,后因曹操谋夺汉中才彼此让步而握手言和。而这一次兵出夷陵是在吴蜀联盟关系完全破裂之后的军事行动,因而,其伐吴总兵力不会低于八万。”^{[2]44}由此可见,夷陵之战中蜀强吴弱的基本态势是毋庸置疑的。

刘备不仅兵力强于陆逊,而且占据着三峡地利和水利。在古代冷兵器的争战中,从江河上游进攻下游,常常具有顺流而下、势不可挡的优势。蜀汉兵发三峡上游的鱼复县(今重庆市奉节县),进攻三峡下游的夷陵地区(今湖北宜昌市),确实占尽了“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1]1004}的水地之利。不可否认,刘备伐吴之初,大有猛虎下山、蛟龙出水而令人生畏的气势。

那么,面对蜀汉强大的军力和凌厉的攻势,吴军主将陆逊采取了怎样的应对之策呢?在强敌大举进攻下,古往今来兵学大师们从不主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与敌人死打硬拼。《老子》云“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第73章);“善胜敌者不争”(第68章);“柔之胜刚,弱之胜强”(第78章)。老子认为只知硬拼斗狠不顾一切的人将会送命,勇敢机智懂得退让的人则会保全生命,善于用兵作战的将帅,是从不与敌人争血气之勇的;弱小者战胜强大敌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守柔示弱,避敌锋芒,诱敌深入,待时机成熟时后发制人,一举消灭他们。《孙子兵法·军争篇》亦明确指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在强敌进攻、锐气正盛时,弱军应先退让一步,避开强敌锐气,待其松懈疲惫、士气衰弱时再实施反击。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更是强调实行退却的巨大战略意义和必要性“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3]203};“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

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3]190}

毫无疑问,实行战略退却是弱军战胜强敌的必要而有效的手段,杰出的军事统帅无不通晓这个道理。虽然《三国志》没有详细记录陆逊在夷陵之战中的具体军事部署,但不难看到陆逊机智灵活地使用了战略退却、后发制人的战争艺术。《三国志·文帝纪》曰“闰月,孙权破刘备于夷陵。初,帝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1]59}此处“闰月”,指魏黄初三年亦即蜀汉章武二年(222年)闰六月。《三国志·先主传》曰:“(章武元年)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军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陆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秋八月,收兵还巫。”^{[1]662-663}陆议,是陆逊的本名。踵蹑,即紧跟、追击的意思。南山,应位于鱼复县(今重庆奉节县)长江南岸,与奉节白帝城隔江相望,李异、刘阿水军追击刘备残部至南山,短暂屯驻后便撤回巫县(今重庆巫山县)。

由《先主传》《文帝纪》等文献记载可知夷陵之战的全过程和陆逊的战略谋划:第一,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七月至章武二年(222年)二月,蜀汉军队处于进攻阶段,吴将李异、刘阿等放弃了巫(今重庆巫山)、秭归(今湖北秭归县归州镇)、夷陵县(今湖北宜昌市西郊)等城池,刘备大军进驻夷道县猇亭(今湖北宜都市西部五眼泉镇和长阳县东部磨市镇一带);章武二年(222年)三月至六月,吴蜀双方处于对峙相持阶段;章武二年(222年)闰六月至八月,吴军发起反攻阶段,大破蜀军,刘备率残兵败将退回鱼复县(今重庆奉节),而吴军追击刘备直至鱼复县南山,剑指白帝城。第二,在蜀军大举进攻时,丢城失地的是吴水军将领李异、刘阿所部,而反攻时紧紧追击刘备残部的依然是李异、刘阿所部,说明李异、刘阿所部最初实行的是边打边退的策略,完整地保存了实力,最终又收复了所有失地。第三,从鱼复县、巫县至夷道猇亭,相距五六百里(古代一里比现在一里略小,曹丕所言七百里相当于今大约六百

里)主要区域为三峡险要之地,处于峡江下游且数量劣势的吴军不利于防守。陆逊果断地采取了避敌锋芒、实行战略退却的方针,将东吴水军主力撤至虎牙荆门西塞(荆门、虎牙二山,夹江并峙,号称“楚之西塞”在今湖北宜昌市东郊)一带布防,又亲率吴军主力驻守夷道猇亭一线,与蜀汉主力对峙,迫使刘备“树栅连营七百余里”,战线拉长,兵力难以集中,最终落得个惨败逃归的悲剧结局。

毛泽东曾经高度赞扬了夷陵之战等著名战役决策的正确“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3]188}可见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大获全胜,首先得益于战略决策上的英明。

二、审时度势,果断调整作战部署

《孙子兵法·虚实篇》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是说用兵作战没有固定模式,如同水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一样,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制定相应对策从而战胜敌人的,就叫做用兵如神。古往今来善谋善战的将帅,无不擅长根据敌情变化而制定合理的作战计划,努力把握战争主动权。

历来多有看不起刘备军事才能者,如魏文帝曹丕云“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1]59}魏名士赵戡云:“(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1]658}台湾三军大学主编《中国历代战争史话》亦云“猇亭蜀军之败,乃因刘备不知兵。”^{[4]327}等等。其实,历史上的刘备并非如小说《三国演义》所写的那样是一个典型的兵家草包。曹操说“刘备,吾俦也。”^{[1]22}贾诩说“刘备有雄才。”^{[1]248}陆逊也说“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1]996}曹操、陆逊、贾诩等杰出军事统帅和谋士都不敢小视刘备而将他看作强有力的对手,说明刘备是一位惯经战阵的沙场老将,夷陵之战与陆逊打了一年有余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因此,过于贬低刘备的军事能力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一个军事指挥员能否在战场上获胜,固然取决于自身的谋略才智,也常常取决于对手是否精明强干。如果吴军统帅是一个碌碌平庸者,那么在夷陵之战中获胜者极有可能是刘备。可惜刘备的悲剧就在于他遇到的对手太优秀,太精明缜密,没有留给他任何有机可乘的余地。

陈寿《三国志》在多人传记中记述了蜀军进军夷陵的部署和吴军的对策,如《先主传》:“二年春正

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军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1]663}《吴主传》:“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1]832}《徐盛传》:“刘备次西陵,盛攻取诸屯,所向有功。”^{[1]959}《黄权传》:“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1]773}《陆逊传》:“逊上疏曰‘……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初,孙桓别讨备前锋于夷道,为备所围,求救于逊。逊曰‘未可。’诸将曰‘孙安东公族,现围已困,奈何不救?’逊曰‘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及方略大施,备果奔溃。”^{[1]995-996}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六十九中亦载曰“汉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使督江北诸军;自率诸将,自江南缘山截岭,军于夷道猇亭。”^{[5]2200}

从上面记载可知如下信息:

其一,陆逊最初担心刘备将全部蜀军主力运送至夷陵城外,然后水陆并进,即刘备步军主力沿夷陵道(汉代由夷陵城通往当阳、江陵一带的驿道)攻击当阳、临沮、江陵一线,而水军主力顺江而下进占西塞、宜都城,再进而配合陆路进攻江陵等重镇。这是蜀军最佳进攻线路和方案。陆逊为了打破刘备之战略企图,便趁刘备主力尚在秭归之际,令宋谦、徐盛等部对先期攻占夷陵城并屯驻城外东西两岸的蜀汉水军营地发起局部反击战,“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五屯,即五座营寨,按一屯一至两千人计算,蜀汉损兵约在五千上下。这大大挫败了蜀汉水军的锐气,使之不敢贸然前进,蜀汉水军自攻占夷陵城之后不见攻城略地的任何记录,也证明了陆逊的反击战沉重地削弱了蜀汉水军的战斗力,起到了应有的震慑作用。吴黄武元年春正月,正是蜀汉章武二年春正月,即刘备大军进驻秭归而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之时。作为蜀汉前锋部队的精锐之师,吴班、陈式水军在半年多的战斗中,攻占巫县、秭归、夷陵等地,战绩显著,但进展顺利无疑助长了其轻敌情绪,又深入敌境三四百里,已成疲惫之师,陆逊趁其轻敌冒进与疲惫不堪之际迅疾发起局

部反击战,重创其实力,其灵活机动善于捕捉战机的睿智可见一斑。

其二,蜀汉水军严重受挫,打乱了刘备最初的作战计划和决心。蜀汉大将黄权向刘备提出由他打头阵进攻“悍战”的吴军而由刘备率主力作“后镇”跟进的方案,但刘备否决了黄权的提议,并调整作战部署,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蜀汉水军约万余人驻守夷陵城,扼守西陵峡口及周边沿江地带,以牵制东吴水军;一路由黄权率领先期抵达夷陵的前锋步军约两万人进驻夷陵道“以防魏师”夹击,并牵制当阳、江陵一线的吴军;一路由刘备亲率主力约七八万人从秭归南渡长江,“缘山截岭”走山道进入江南夷水(今习称清江)流域,进驻夷道猓亭一带,以期夺取宜都城,然后与西陵峡口水军夹击东吴水军,夺取西塞关隘,再顺流而下与黄权率领的“江北军”夹击江陵等重镇。可见,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最终布设了一个弯曲的长蛇阵,营寨横跨大江南北,绵延数百里,兵力分散,交通阻隔不便,难以起到相互策应和支援的作用。

刘备没有将主攻方向选在江北夷陵道和长江水道上,主要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忧虑“吴人悍战”,即东吴水军强悍善战,技能娴熟,水上作战罕有对手,遭受重创的蜀汉水军战斗力更加有限;二是担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即害怕曹魏军队与吴军联手夹击蜀军,使其腹背受敌,两年前关羽一败涂地丢失荆州正是吴魏夹击所致。刘备的担心固然不无道理,但此一时彼一时。三国争雄此消彼长,都不希望对手强盛而威胁到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当关羽势力

在荆州急速膨胀之时,吴魏均感到了严重威胁,故而联手消灭了关羽。而在关羽毁败蜀汉丢失荆州之后,东吴实力大增,这是曹魏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吴蜀交兵曹魏不会轻易联吴击蜀的,只会采取坐山观虎斗之策。《三国志·刘晔传》记载魏资深谋士刘晔曾建议曹丕乘机袭击东吴“可因其穷,袭而取之”^{[1]336},正说明曹魏集团忌恨东吴得志的心态。可见,刘备不仅缺乏以弱胜强的军事信心和拼死一搏的战斗意志,还对吴魏关系和争战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判。这种错误的估判直接导致了主攻方向的错选和整个战役的失败。

其三,刘备在江北陆路和长江水道上采取守势,而将主攻方向放在江南山地,如此排兵布阵正中陆逊下怀。陆逊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兵力应对:一是料定黄权江北军专“防魏师”,不敢对吴轻举妄动,因而置黄权军于不顾,仅令驻守当阳一带的吴军偏师监视黄权所部;二是令水军将领李异、刘阿、徐盛等部布防楚之西塞一线,钳制蜀汉水军;三是令骁将孙桓驻守坚固的夷道城(汉武帝时为开发西南蛮夷地区,特地修建了一条驿道,称为夷道,并设置夷道县管辖,县治可能位于今湖北宜都市城西十五里处清江北岸),以吸引大量蜀军围困攻城,消耗其实力;四是坐镇宜都城(最初应由蜀汉宜都太守张飞修建,后陆逊加以扩建,位于清江入江口,今湖北宜都市西城),将吴军主力移防夷道猓亭一线,扼守关隘,与刘备大军对峙,使吴蜀夷陵之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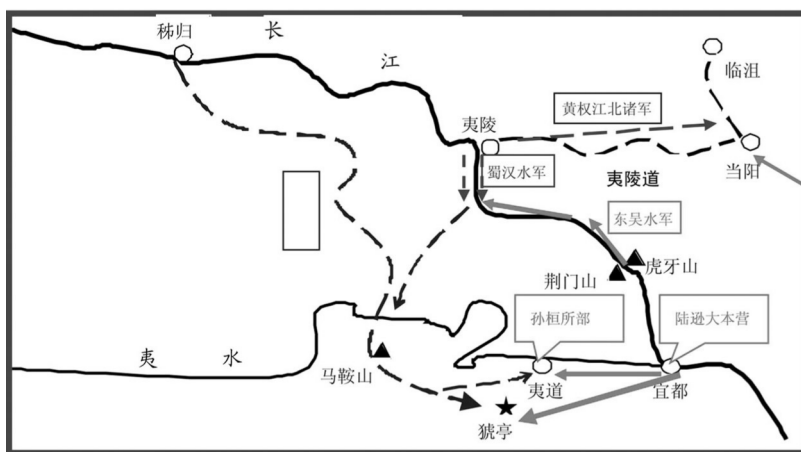


图1 吴蜀夷陵之战相持阶段示意图

陆逊不愧为聪明睿智的军事统帅,善于从实际敌情出发,不断调整攻守方略,灵活机动,部署周密得当,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将蜀汉大军牢牢地钳

制在漫长的战线上,使其首位不能相顾,锐气消磨殆尽,为后期的大举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孙子所谓“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指的正是陆逊这

种务实权变的军事头脑和作战技巧。

三、忍辱负重 耐心寻找歼敌战机

蜀汉章武二年三月至闰六月,是吴蜀双方相互对峙、难分难解的阶段。在四五个月的相持中,陆逊作为吴军统帅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这种压力首先来自蜀军的咄咄逼人,刘备选择江南夷水(清江)流域作战虽然不是最佳方案,但清江西高东卑,其东端多为低矮的丘陵谷地,翻过猇亭一带的山地就可以进入宜都平原,直捣宜都城。蜀军士兵多擅长攀爬的巴民彝人,惯于山地作战,又占有凭高直下的气势,对吴军构成巨大威胁。而参加夷陵之战的蜀军骨干将领,如大都督冯习、前部张南、别督辅匡、别督傅彤、牙门将向宠及先锋吴班等等,他们大多为荆州人,故地田宅为东吴所据,因而他们皆是刘备伐吴之战的坚定支持者,作战无不奋勇当先,吴军稍有差池就会折戟猇亭。

陆逊承受的压力更大来自吴军内部。《三国志·陆逊传》载“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1]995-996}诚然,这些参加夷陵之战的吴军骨干将领,无一不是资深名重的宿将,几乎都参加过赤壁之战、合肥之战、荆州袭击战等重大战役。韩当为孙坚旧将,乃三代元老;宋谦为孙策旧将,随孙策征战多年;潘璋、朱然、徐盛都是孙权宠信的名将,是堵截追杀关羽父子的功臣;鲜于丹为吕蒙之骁将,作战勇猛,多有战功;孙桓乃孙权族侄,亦是东吴著名悍将。他们最初对于陆逊为帅并不服气,对于陆逊的军事部署多不认同,目中无人、傲慢无礼之态可想而知。那么,承受巨大压力的陆逊是如何化解这些内外矛盾的呢?他又采取了何种手段一举战胜强敌呢?

第一 忍辱负重 团结内部共济国事。

《孙子兵法·计篇》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认为杰出的将帅应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大基本品格和素质。“智”指知识才智,“信”指言而有信,功必赏,罪必罚,“仁”指对待部下宽厚仁慈,“勇”指作战勇气和决心,“严”指管理军队纪律严格,军令必行。任何初掌兵权的军事统帅绝非一开始就具有众望所归的军事威信,非凡的威信声望是靠聪明才智和优秀品格建立起来的。

陆逊出身书香家族,为人低调谦卑,夷陵之战前并不特别显山露水。《三国演义》根据《陆逊传》关于

“〔诸将〕各自矜恃,不相听从”的记述,虚构加工了东吴全体大将们极端蔑视和讥笑陆逊的生动故事,不难看出陆逊所遭受的屈辱和压力异乎寻常。但这些文学故事无疑是历史的真实反映。《陆逊传》载曰“逊按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权闻之,曰‘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逊对曰‘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弩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1]996}

这段文字记录分明透露了陆逊与诸将之间的巨大矛盾,诸将蔑视主帅、不服从调度的现象十分突出,否则温文尔雅的陆逊就不会“按剑”训诫。而陆逊对于矛盾的处理极为巧妙得当。首先,忍辱负重,以战国名相蔺相如和东汉名臣寇恂为榜样,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对诸将傲慢无礼与咄咄逼人的态度隐忍不发。其次,刚柔并举,宽严有度。陆逊待人处事原则性强。当大将们“不相听从”严重影响军事计划的执行时,陆逊“按剑”而对,一面向大家讲明形势的严重性,必须团结一心,全力以赴以保障国家安全,一面郑重申明“军令有常”,无论谁触犯军令将严惩不贷。但陆逊并没有把诸将不听号令的行为上报孙权,对他们予以打击报复,足显其对部下爱护有加的仁厚品德,也最大限度地化解了内部矛盾,团结了众人。毫无疑问,面对矛盾冲突,陆逊刚柔并举,宽严得体,表现了一位杰出将帅应有的信、仁、严等优秀品格,最终实现了将相和睦“共克定大事”的目标。

第二 沉重冷静 不逞血气之勇。

当敌对的两支军队相持不下的时候,将帅的个性修养和心理素质往往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孙子兵法·军争篇》云“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子所谓“心”,指的就是将帅的思想、情绪、意志、决心等等。显然,孙子认为杰出的军事统帅除了应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方面的基本品格外,还应具备良好的稳定的心理素养。《孙子兵法》一再论及这个问题“良将修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统兵的将帅不应情绪躁动不安,绝不可一怒之下而逞血气之勇,与敌人

轻率作战。为什么呢?因为“忿速,可侮也”(《九变篇》),即易怒急躁的将军很容易做出轻率之举而中计,最终受到极大的侮辱。那么,如何做才是合理恰当的呢?“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即将帅面对复杂敌情,当镇静深思,以静制动,严正而有条理地制定行动方针,对我方有利则相机而动,不利则止,以静观变,等待时机。《老子》也特别强调将帅的心理素质问题“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68章)即善于统帅军队者,不逞勇武之气;善于指挥作战者,不轻易发怒;善于战胜敌人者,不同敌人争强斗狠。不逞血气之勇,不是胆怯懦弱,而是军人真正的“勇”。

陆逊正是孙子和老子所称道的具有良好心理素质的杰出将帅。《三国志·陆逊传》载曰:“(刘备)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1]996} 骁将吴班当是蜀汉水军失利后被刘备调至猇亭前线的。刘备为了打破对峙僵局,亲率八千精兵悄然埋伏于山谷之中,再令吴班率偏师数千在平地立营挑战。《三国演义》写吴班所部大多是老弱之兵,他们故意“赤身裸体,或睡或坐”“辱骂不绝”,以激怒吴军出击。这大体符合客观实际,因为吴班所率乃诱敌之兵,辱骂和示弱是诱敌出战的常用手段。如果吴军此时贸然离开关隘攻击吴班所部,那么刘备埋伏的八千精兵将从侧后截杀吴军。这八千精兵当是蜀军精锐中的精锐,主要由巴蜀健儿组成,擅长山地冲锋,一旦出击,便如猛虎下山,吴军命运可想而知。小说描写吴兵望见八千精神抖擞的巴蜀子弟兵,“尽皆胆裂”,虽然是文学夸张之笔,但确实反映了蜀军精锐战斗力之强悍。然而,刘备的诱敌之计在冷静的陆逊面前起不了任何作用。当东吴大将领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攻击吴班时,陆逊镇定自若,洞若观火,不为表象所迷惑,不因谩骂而恼怒,不逞血气之勇,下令各部谨守关隘,“且观”其变。刘备无可奈何,只好撤出伏兵。冷静的头脑、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陆逊战胜刘备和强大蜀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耐心等待战机,利用天时地利以火攻制敌。

在夷陵之战中,陆逊采取的基本策略是避敌锋芒,据关守隘,与敌打持久战。持久战对于刘备十分不利,因为蜀军远道而来,粮草运输必须途经三峡山

川险道,困难重重。但持久战对于陆逊亦存在较大风险:曹魏伺机而动,东吴战将们和水军主力长期滞留夷陵,则东部数千里长江防线随时可能遭到曹魏军队偷袭。所以,长期僵持下去不是陆逊和孙权愿意看到的局面,必须尽早打垮刘备以解决吴国西部忧患,然后全力对付曹魏军队的觊觎。

但陆逊并未急于求成轻率出击,而是耐心等待时机。吴军发起大反攻的时间是章武二年(222年)闰六月,农历闰六月大约是公历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正是夷陵地区高温炎热之际,也是江南丘陵山地茅草树木丰茂的时节,对于久困疲乏的蜀军而言极其不利,正如陆逊所言“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1]995} 《三国演义》描写天气酷热难耐,刘备只好下令蜀军移营“于林木阴密处所避暑”,诸葛亮见了马良送来的驻营图本后长叹一声说“汉朝气数休矣!”这一情节虽属虚构,但富于历史真实性。诸葛亮哀叹,是他料到陆逊会充分利用高温炎热天气对“林木阴密处”的蜀军发起火攻战术。果然,深夜突起的冲天大火烧毁了刘备夺回荆州的梦想,陆逊“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1]995}

从章武二年春二月直至盛夏闰六月,吴蜀对峙五个多月之后,陆逊才发起大规模的反攻。他是否有意识地拖延时间以创造最佳的反攻时机呢?今天不得而知。但他趁高温酷热、草木茂盛时节对蜀军实施火攻战术,则无疑是一种利用天时地利的聪明之举。

第四,乘流断围,迂回包抄。

《三国志·黄权传》载“吴将军陆议乘流断围,南军败绩,先主引退。而道隔绝,权不得还,故率将所领降于魏。”^{[1]773} 这既是对黄权投降曹魏原因的说明,也是对陆逊反击战术简单而明了的记载。如上图所示,刘备在狐疑忌惮心理的作用下摆了一个跨江南北的长蛇阵,黄权在江北,刘备在江南,中间由据守西陵峡口和夷陵城的蜀汉水军连接,峡口是蜀军之命门,只要将命门掐死,南北蜀军不但不能相互策应,黄权所部的退路也完全被堵死,更要命的是,吴军逆水而上攻占秭归城,可以截断刘备江南主力的水陆退路,对蜀军构成致命性的威胁。

事实上,陆逊下令全线反击,步军以火攻突袭刘备军营,而水军则“乘流断围”,即逆水而进,一路沿清江追击刘备,另一路主力以凌厉的攻势一举击溃蜀汉

水军,夺取峡口和夷陵城,截断了黄权江北军的退路,并迅速追击败退的蜀汉水军,向秭归进军,迂回包抄刘备之主力。《三国志·陆逊传》记载刘备猇亭溃败后退守马鞍山(今湖北长阳县磨市镇西郊),“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1]995}。这说明猇亭溃败时刘备主力并未遭到致命性打击,他尚能组织数万人马登上马鞍山。刘备以马鞍山为据点,有着凭高守险的地理优势。然而当陆逊四面攻击马鞍山时,刘备便不堪一击,吓得仓皇夺路而逃,最终落得个“死者万数”的惨败结局。原因很简单:一是陆逊仍然以火攻战术使刘备大军难以施展山地战的特长;二是东吴水军的包抄使刘备方寸大乱,无心组织有效的防御。马鞍山方圆三十里,位于清江南岸,站在山顶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脚下弯弯曲曲的清江,还能隐隐约约望见远处的长江。刘备之所以乱方寸,是因为东吴水军船队可以绕到马鞍山北边,阻断蜀军回撤秭归的退路,更让刘备揪心的是,一旦东吴水军夺取了秭归城,则长江水道和秭归江北栈道均被截断,刘备将成为瓮中之鳖。因而刘备只得丢下他的数万人马,带着亲兵夺路逃窜。

在蜀汉水军拼死抗击以致全军覆没为刘备北撤赢得宝贵时间的情况下,刘备残部终于赶在东吴水军到来之前“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1]663},而“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1]995}。可见,夷陵之战中陆逊实施水陆协同作战,前追后堵,将东吴水军的优势和作用发挥到极致。

刘备败逃到白帝城后曾长叹一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1]995}认为蜀军惨败夷陵乃天意天命使然。这无疑是刘备的自我开脱,使其惨遭“折辱”的不是天意而是人谋。从战役整个过程看,吴军统帅陆逊沉重冷静,首先实施退却战略,造成蜀军战线拉长;继而利用有利地形守关据险,钳制蜀军,牢牢地把握了战争主动权;最后,在蜀军疲乏松懈、锐气尽情之时发起猛烈反攻,水陆并进,迅雷不及掩耳,使蜀军全线崩溃。真可谓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充分显示了一位杰出军事家过人的谋略智慧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对于今天的军事学界依然有着深刻的教育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杨和平]

参考文献:

- [1] [西晋]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 王前程.夷陵之战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 [3]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0-244.
- [4] 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话[N].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
- [5]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

A Study on Lu Xun's Military Tactics in Yiling Battle

WANG Qian-c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key battle of Yiling between Wu country and Shu country, commander Lu Xun of the Wu army played a decisive role. Facing the large-scale attack of Shu army, Lu Xun took the strategy of retreat to void the enemy's attack. Based on the actual enemy situation, he decisively adjusted his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tactics, exercising flexibility to grasp the initiative in the battlefield. When the war was at a stalemate, Lu Xun endured humiliation in order to carry out an important mission and did not try his bravery and waited patiently for the right time to annihilate the enemy. In the phase of counteroffensive, he exploited the advantages of weather and location to attack the enemy by fire, and gave full play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naval forces to break the enemy's retreat, causing the whole army of Shu to collapse. The mentioned above fully shows Lu Xun's extraordinary strategic wisdom and superior military command art as an outstanding military strategist and has profou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for today's military academics.

Key words: Yiling battle; Lu Xun; enduring humiliation in order to carry out an important task; defeating the strong by the weak; military command art